

【传承与脉络】

#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 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梳理

孙飞宇

---

**内容提要：**本文从费孝通在1936年江村调查之前的作品入手，通过细致梳理文本，力图为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动态做一简单勾勒。从早期思想出发，本文发现，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平衡的思考，乃是费孝通早期学术思想的核心关注。社会变迁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也是费孝通思考的基本出发点，而社会平衡则是他在早期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所提出来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尽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及其后来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以社区研究闻名，然而社区研究只是其核心关怀的载体。应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平衡的思考，费孝通发展出了关于社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论。这都在后来的江村调查与《江村经济》的写作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平衡；江村调查

---

《江村经济》一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早已有定论。以往关于该著作的评论通常将其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该著作会被认为是由新一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学人<sup>①</sup>所做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变迁的新式研究。而费孝通本人也曾自认属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张冠生，2000：645-646）。另一方面，在最近大陆关于费孝通的研究中，也开始关注他作为或者说自视为“士绅”的一面（杨清媚，2010）。要言之，无论是费孝通本人还是关于他的研究者，都不会忽略在他的思想中传统与现代双重性的叠合。这一双重性体现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所具有实质性问题意识，特别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绅的情怀，而与此同时，他的这种传统情怀是通过新式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来自于何处，又如何具体体现在其实地研究中？本文试图从《江村经济》一书成文前的费孝通思想进展理路来考察该书的思想背景，以便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了确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所受到的影响，本文采取了一个保守

---

**作者简介：**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

<sup>①</sup> 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称费孝通为一位公民——“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2013：7。

的做法:系统分析在1936年之前费孝通的作品。这些前期的作品在今天的费孝通研究中仍然较少得到重视,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早期研究都是对于人物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费孝通在早年所受的影响十分广泛,既包括旧学的影响,也有五四运动以降新思潮的影响,或者是具体而言,他当时的师友如吴文藻、杨开道、林耀华、李安宅以及他的阅读所及如派克、马林诺夫斯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学术影响当然并非仅由其作品反映出来,但是他的早期作品,至少是我们在研究层面上可以明确划定的研究范畴。通过细致分析其早期作品,本文发现,费孝通这些前期作品中所明确提出来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论,是进入和理解《江村经济》一书以及江村调查的核心线索。

## 一、核心关怀:社会变迁与寻找出路

费孝通前期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文化与社会变迁领域。这一点当然与那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救亡图存”的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这是一种社会主要思潮的反映。在费孝通1933年正式开始学术写作之前,于1932年8月份所作的《〈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中,已经清晰表明了这一关怀,以及寻找中国出路的志向。就此而言,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一个中国社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对于社会变迁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在1933年6月10日的《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费孝通以“亲迎礼俗”为例,讨论了文化变异的基本结构与形式,以及作为其核心关注点的文化遗产与变化。此外,在本文中,费孝通还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费孝通,2009:91)。这篇文章将文化失调定义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2009:91)。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种理解。首先,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其次,是讨论文化变迁的路径或者说模式;第三,是对于变迁本身的关注。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可以在后来费孝通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中找到线索。而后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既是江村调查中费孝通的核心关注,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孝通在1940年左右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做札记中的核心关注点,即文化模式(生活系统)的变迁及调试问题(王铭铭等,2016)。前后两种关注点一脉相承,显然是出于中国文化大变局之中的根本理解。

费孝通前期对于社会变迁的集中思考还体现在他在1933年对于杨宝龄先生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哥根宗派之客民》这篇读书笔记中。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杨宝龄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背景的人,是如何在美国融合成为一种新式美国文明的。这一关怀显然是出自于对于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变迁的关切。本书尤其与该主题有关,因为虽然本书所关心的表面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的俄籍摩洛哥根宗派在美国社会的融入问题,然而该派别的一个重要特点使得费孝通可以藉此关心中国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变迁的问题:该教派传统坚实信仰的变迁,亦可理解为其在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试图通过作者对于俄籍摩洛哥根宗派在美国变迁的研究,找到思考中国文化受到外来现代化影响而产生的变迁的线索。

这样的思考直接体现在了江村调查之中。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也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马林诺夫斯基,2013:7)。不仅如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抓住

这一关键点的原因在于,他注意到了江村这个小小的村落所代表的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马林诺夫斯基,2013:7)

## 二、“活的”社会与现实取向

费孝通早期的研究方法受惠于大学时期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训练。不过,这一研究方法在以时间为序的各篇文章中逐渐成型,并最终在江村调查中得以呈现,则与其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费孝通全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作品,在《江村经济》一书成文之前,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性写作,以1933年的《人类学几大派别》为起点。在本文中,费孝通已经表达了对于功能学派的服膺之意,其研讨的主要材料则来自于《野蛮人的性生活》一文。

《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对于早期费孝通影响极深,以至于在1933年,费孝通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该书的读书笔记。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性,家庭,亲属关系乃是有机的整体”(费孝通,2009:97),这一理解日常生活的角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费孝通后来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核心角度。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还表达了一个对于马林诺夫斯基作品的赞赏之意:即马氏以极为明白晓畅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费孝通,2009:98)。费孝通在1933年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于此种写作风格的赞赏。我们知道,这一语言文字上的风格在后来亦已成为费孝通著名的写作风格。我们并不能完全说费孝通的写作风格全从马氏而来。因为尽管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他可以用非常典雅的古文体进行写作<sup>①</sup>,然而在读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之前,也即在1933年之前,费孝通已经开始着力于此种风格的白话文学学术写作。也即,在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风格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亲和力”。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风格,在费孝通看来,是与对社会及社会学研究的理解有直接关系的。他相信,唯有此种写作风格,才可能实现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的呈现。所以,在阅读了杨宝龄的著作之后,费孝通如此写道:“读完了全书,和读了其他芝加哥社会学丛书一般,使人觉得所读的简直是一本亲切有味的小小说。它所表显的是人生底层的活动,是活的人生。社会学的对象本来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生活本是活的、动的、变的。”(费孝通,2009:114)

在1933年的《社会研究的程序》一文中,费孝通开始明确提出他早期学术研究的主张。在本文中,费孝通首先提出,“社会研究是叙述社会事实的科学”(费孝通,2009:101),并随即指出,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同。原因在于,“社会理论是在种种社会事实中推求社会存在和演变的原理,而社会研究是只限于事实的叙述和描写”(费孝通,2009:101)。这二者互为表里,不可或分。但是,在研究中将二者区分的做法,乃是出于一种程序上的方便,也就是说,是“指在叙述时所用的方法和推求原理时不同”(费孝通,2009:101)。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是研究切入的角度,亦即“从何叙述起的问题”(费孝通,2009:101)。费孝通分四个方面详述了这一问题。

(1)确定研究对象或者说描写的单位,也就是群的单位。这是一种社会研究上的实质性讲法,因为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而群的同质性意味着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会学研究的形式上的同一性。在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研究中,这往往意味着某种习俗或者风俗。所以第一步既是形式上的界定,也是性质上的

<sup>①</sup> 如1930年的《第五届华东暑期大学东吴同学会杂记》,参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77-79页。

界定。

(2)对社会状态的研究,亦即“从何描写”(费孝通,2009:102)。费孝通在此从时空二分的角度入手,提出了首先划分为“状态”和“变迁”这两个交叉轴的研究角度。对于社会状态的研究,要以“方便”为宜,即写下首先观察到的有形之物。费孝通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对于物质文化的分类记述开始,进而记述使用物质器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推到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入手,必然要上升到社会得以维系的“公共意志”(费孝通,2009:104),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具体是呈现在作为社会意志之体现的社会行为之上的。费孝通在此讲了一段极富深意的关于社会研究的话:

“社会组织是可以从个人行为上看出来的。当然,有时,我们可以得到种种成文的规则和条文,但是成文的规则和条文并不是社会组织的本身,因为有很多规则和条文是不实行的,甚至和实际的行为相反的。所以描写社会组织时虽可以将成文的规则和条文作为参考,但决不当以规则和条文为中心事实。”(费孝通,2009:104)

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依然极富启发性。费孝通的基本意思,是将社会及其行动者视为活生生的、有自身主体性意义的状态,而非死的条文和规则。本文认为,这是费孝通早年的核心思想之一,因为该思想并非偶然地出现在这一篇论文中。在1933年与1934年的作品中,费孝通屡次提及这一观点。在1934年的文章《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中,费孝通明确说:“我们已经屡次说过,一切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办法,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无从说起的。”(费孝通,2009:236)此外,这一核心主张与费孝通所选择的写作风格有直接关系。或者毋宁说,正是这一对于社会及其行动者的观点,才使得费孝通有了上述关于写作手法和风格的态度。

对于社会状态研究又分为(a)物质文化;(b)社会组织;(c)社会态度,亦即代表着不同社会文化之特定意志的群体性社会态度。而社会态度的养成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费孝通,2009:105)。若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变迁性增大,那么不同社会态度之冲突亦可明显增加。

(3)社会变迁历程研究。这一点又分为(a)冲突;(b)调解;(c)同化。社会态度在整体上会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变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历程即“如何变法”;二是变迁历史,即“变得怎样”。历程是“一种动作”,与其相对应的是,“态度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是不同生活方式冲突在心理上发生的反映”(费孝通,2009:106)。所以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变迁第一历程是“冲突”(费孝通,2009:106)。而第二历程则是调解,继之是同化。这三种历程就是变迁的历程。

(4)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相较于普遍性的变迁历程,还存在着具体的、个别的变迁史(费孝通,2009:107)。与历程比较起来,历程是形式,而历史则是内容。如传统中国的族居制到颇具现代意义的分居制。这是变迁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变迁历史并非普遍,然而却是普遍形式的具体内容。

总之,在这篇论文中,费孝通明确确立了他早期的研究态度和写作风格,并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基本态度和风格。这种“活的”社会与现实取向及相应的写作风格,还在费孝通1933年其他的重要论文中得到了体现。

在1933年,费孝通的作品还表明,他明确受到了来自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的影响。在《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一文中,费孝通再度表达了对于某种“鲜活的”社会认识与写作风格的赞许。在文中,费孝通认为,派克之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正宗,乃是因为其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文本本身

而在于日常生活本身:

“他有一种魔力能把他的学生从书本上解放出来,领到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是他在社会学界中树下百年基石的工作。”(费孝通,2009:137)

由于派克对于早期费孝通的影响很大<sup>①</sup>,所以他对于派克的论述在1933年成文两篇。第二篇是比较讨论派克与季亭史(F. H. Giddings)的思想分歧点的工作。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早期所受到的派克思想的影响,着重在于身心交感论的、集合主义的观点,主张“统计方法不足完全解释社会现象,故重个例方法”,主张侧重对于社会形式的研究(费孝通,2009:168)。

1933年,费孝通在燕大毕业之后,受到了梁漱溟的邀请赴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工作。(阿古什,2006:29)在当年11月,费孝通撰写了《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一文。文中颇有批评之意。费孝通明确提出,在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不能仅仅关注农村问题。<sup>②</sup>也就是说,变迁的研究必须要将都市问题纳入进思考范畴。所谓社会变迁,其最重要的动力,则在于“各种不同生活形式的接触”,然而根据上文的定义,生活形式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生活中,这一界定要落实在“人口的流动”之中(费孝通,2009:125)。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城市工业的发展、现代性分工的出现和相应的人口流动和聚集,这一点是与乡村社会不同的。然而与此同时,在都市生活中,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费孝通在本文中以颇具芝加哥学派的风格,将其称为都市中的“自然区域”(费孝通,2009:129)。根据这篇论文的主张,本文此前所关注和总结的变迁历程和具体历史、人口的接触、区域的结构等等,都要基于这一前提来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哪怕对于乡村的研究,也要以乡村社会变迁作为基本背景。原因在于,变迁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的基本特质。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就必须要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为基本思考的出发点,而非以某种理论为基本思考的出发点。费孝通进而为他的这一基本学术主张定性: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在《江村经济》中的前言中,费孝通不无深意地强调说,当时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基于现实材料的对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这种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当时的中国是迫切的,因为这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亦即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在这种各派知识分子都承认的前提下,费孝通委婉批评了某些思想派别不从事实出发,而只从思想理路出发的做法:

“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费孝通,2013:15)<sup>③</sup>

① 费孝通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参见《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载于《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第10页。

②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践运动。在其基本成果《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先生也从乡村问题开始讨论中国问题,并且也同样提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失调,“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2011:23)。然而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于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的刻画不同,梁漱溟从一开始则判断“我们旧日的社会已崩溃到最深处,故必从头作起”(梁漱溟,2011:6)。由于将乡村问题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梁漱溟,2011:20)。

③ 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比较起来,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理论及相关研究,显然更像是一种理论,而非针对社会事实的田野工作。

### 三、具体研究中的整体性思路

费孝通对于现实社会变迁的关怀,以此种态度具体实施在了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探索之中。一方面,费孝通主张关心和理解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变迁,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和写作手法的采用,也要以此为基准。在这两种态度下,费孝通的实地研究及其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为中国社会的变迁找到一条出路的具体实践层面。而在这一态度下对于具体社区的研究,也从一开始就将社区视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费孝通说: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通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费孝通,2013:15)

这一观点并非在《江村经济》和江村调查中首创。在1933年一篇假托姐姐费达生之名的文章中,费孝通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农村建设实践的积极关心,总结了由其姐姐所参与农村建设的经验,初步显露出了他后来“志在富民”的社会学研究态度。在这篇《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的文章中,费孝通明确提出了数个在后来得到充分发展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首先从农村建设的实际经验中来。在该文中,作为这些观点的统领,整体性思路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通过举出简单的将机械应用到农村而帮助抗旱,反而导致许多男性农民有闲而去赌博,并由此倾家荡产的例子,费孝通明确提出:社会改良要谨慎思考、应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原因在于,“社会不是一个各部分不相联结的集合体。反之,一切制度,风俗,以及生产方法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要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分和可能引起的结果”(费孝通,2009:116)。所以,单纯引入科技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因此而简单地为人民带来幸福。技术的进步必须要与“适当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费孝通,2009:118)。不过,这一点仍然不够。费孝通在本文中进一步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同感引入讨论之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家庭/家族认同与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冲突,被费孝通称为“或是中国前途最大的一个障碍”(费孝通,2009:119)。这一观点意味着,费孝通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认同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在本文中,他的基本观点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制度,以“使经济生活融合于整个生活之中”(费孝通,2009:121)。其目的则是经世济民,即在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情况下,“使我们能以生活程度的伸缩力求和资本主义的谋利主义相竞争”(费孝通,2009:121)。这一点与涂尔干社会学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然而其思考进路则大相径庭。原因当然在于两种社会传统及其变迁历程的截然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以某一村落的具体社区情况为例来说明问题,已经初步具备了后来在江村进行社区研究的特色。不过,正如在本文中所以体现出来的,以某个村落为单位进行研究,并不意味着将该村落与外部世界隔绝。整体性的思路意味着,费孝通敏锐关注到了一个小小村落里所发生的故事,与世界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主张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费孝通,2013:18)。

费孝通在1933年工作的重点,最后落实在了著名的《亲迎礼俗之研究》一文中。本文的研究与传统经学关于礼的研究不同,着眼的是“礼俗”。而这一对于礼俗的研究,又着眼于该种文化的传播过程、地理与

社会限制。在该文的写作中,体现了费孝通在此前所发展出的种种学术主张,尤其是与文化传播变化相关的主张。在这一系列的学术主张中,费孝通首先强调的是文化的整体性。费孝通说:“一地之文化并非为一堆不相关涉而独立之文化特质所聚成,乃一错综交杂,有整体性之结构也。任何文化特质欲存在于一地文化结构中,必须与其他特质维持相当关系。”(费孝通,2009:190)。

在这个基础上,要理解文化的变迁并非易事,因为它与整体性的文化结构和具体的人性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费孝通的亲迎礼俗之研究的出发点,仍然在于文化变迁的内在机理。费孝通在本文中的研究思路表明,只有从这一出发点开始,才有可能理解作为整体的文化变迁现象。也就是说,研究的整体性思路,与理解细致的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社区)内在机理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上述在费孝通前期思想中所提出来的整体性思路以及贯彻整体思路的研究手法,在“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的写作中得到了极为具体的体现。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江村经济》一书的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马林诺夫斯基,2013:10),然而调查和写作的结构,却完全是一种既极为具体,又极为全景式的手法。在这个思路中,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把经济理解成为了一种整体性生存状态。从文化对于消费的影响,到亲属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乃至费孝通后来总结江村调查的经验时所强调的其中“关键”,即小店的稀少数量作为理解江村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关键,都体现出了这种整体性的思路。例如,在“资金”一章,费孝通开篇即说:

“在这一意义上讲,相互之间的义务,互相接待留宿,互赠礼物等非即刻交换的形式也是信贷的形式。这些信贷的偿还是通过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证的,并与亲属关系及友谊有密切关系。”(费孝通,2013:199)

本文认为,这是江村调查所体现出的“社区研究”的核心特征所在。

#### 四、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

费孝通从早期开始,所侧重的社会变迁研究就并不完全是社会进化论的。这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他在后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论的早期萌芽。在1934年3月份的文章《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一文中,费孝通在总结对于社会进化论的讨论时认为,他可以将社会进化论理解为“有方向的社会变迁”(费孝通,2009:235)通过这一界定,他反对社会进化论中认为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从“坏社会”进化到“好社会”的观点,认为只能承认社会变迁存在着一定的方向。而这种方向,只能是“指在前期所发生的变迁中所循沿的趋势,对于后期亦是正确的。易言之,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各时期是一贯的”(费孝通,2009:235)。

而关于不同社会的价值差异问题,在1936年的《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一文中更是得到了明白的叙述。费孝通在本文中借助王同惠之口,明确反对了那种以某种特定的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其他社会文化之价值的做法。在这一态度的基础上,费孝通更是将社会进化的目的落实在了“社会平衡”之上。也就是说,费孝通并不认为社会发展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目标或者模板,而是在于该社会在整体上的平衡——“所以变迁是在要使人能维持他个人和种族的生产。为了要谋生存,他生活的办法一定要和他的处境保持一种平衡”(费孝通,2009:238)。

不过,这种基于生存前提的平衡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功利主义原则。1934年,出于对社会变迁或者说发展的关心,费孝通专文讨论了霍布浩士的社会发展论。从对于霍布浩士的文献回顾中,费孝通认为,关于

社会发展之理论的起点之一,就在于反对简单的生存论(费孝通,2009:272)。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特性,可以表述如下:

“社会发展之性质,并非和行星一般有一定的轨道,亦不像生物的生长,由幼而老有一定的时代。实是一串继续努力,在环境中争执,忽左忽右,要使它的目的能实现……所以社会发展不如说是一个多方发展的胚种,因为在其起初时,自身没有调节的能力,所以时有片面的发展,以致不易兼顾各部分,以维持其和洽之状态。”(费孝通,2009:285)

从1933年到1936年,费孝通早期思想中慢慢呈现出对于功能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而这一点在《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个具体的社区研究中得到了贯彻。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孝通在回答为何要做实地研究这一问题时,回答说:

“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费孝通,2009:431)

费孝通在其后期曾经反思过当初所从事的社区研究以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不足。(费孝通,2004:220-221)不过,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他在前期对于传统文化没有强调。恰恰相反,在其《江村经济》一书的前言中,费孝通也曾明确说: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费孝通,2013:13)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简略总结。费孝通在其“江村调查”和写作《江村经济》之前的前期思想中,就已经显示出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对于中国所遭遇的“千年变局”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作为传统“士人”情怀之体现的对于这一变迁之出路的寻找,另一方面是将这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及相关的实践置于了现代科学社会的范畴之中。费孝通在其早期如何理解社会研究的科学性?这一问题也就是上述双重性如何具体落入到社会研究之中的问题。在这里,费孝通一方面由于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而发展出对于社会具体现实的“活的”研究取向和写作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下所发展出来的对于具体社区、变迁以及社会建设实践的整体性理解,而另一方面,也将对于整体性的理解放置在了细致的内在机理和结构的讨论之中,主张认真对待社会内在的结构、功能和机理,要以最细致认真的态度来理解“活的”社会和作为主体的社会行动者,要求从现实出发而非从理论设定出发来提出社会建设主张。在这一系列体现在“江村调查”之中的研究主张中,费孝通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秉承着开放的、尊重现实的态度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同时认为这一变迁以及应对这一变迁的社会建设实践,应该落实在各种文化要素、结构和力量的平衡之中,而非采取任何一种简单粗暴的理解、研究和建设态度。虽然本文无意通过费孝通前期思想来统领其毕生漫长的思想之路。不过,本文主张,这一态度和主张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江村调查”和《江村经济》的写作。进而,对于费孝通前期思想的理解,也许还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后来的各种研究以及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各种主题研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主张。

#### 参考文献:

阿古什,2006,《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马林诺夫斯基,2013,《“江村经济”序》,费孝通,《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费孝通,2004,《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9,《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13,《江村经济》(修订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梁漱溟,2011,《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清媚,2010,《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张冠生,2000,《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
- 王铭铭等,2016,《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 From Social Transition to Social Balance: A Summarization of Fei Xiao-tong's Thoughts before His Jiangcun Fieldwork

SUN Fei-yu

**Abstract:** Starting from Fei Xiao-tong's works before his fieldwork of 1936 in Jiangcun, and through a close analysis of his texts,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Fei Xiao-tong's early thoughts.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Fei's core concern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ansition and social balance. While social transition wa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China by that time and wa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of Fei in his early period, social balance was the target for him by that time of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had shown influence on him of the Chicago school. Although Fei was famous for his community study in his book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 community study was majorly his means of core concern. As a result of his studies on social transition and social balance, Fei develops his basic train of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tudy, all of which had been shown clearly in his fieldworks of Jiangcun and writings of the book Peasant Life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Transition; Social Balance; Jiangcun Fieldwork

(责任编辑:储卉娟)